

日本特殊主義與美國例外主義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相信很多人都聽說過這個笑話：「你如何稱呼一個能講三種語言的人？」「Trilingual。」「你如何稱呼一個能說兩種語言人？」「bilingual。」「你如何稱呼一個只可以說一種語言人？」「美國人。」在亞洲，答案是「日本人。」

最近筆者剛剛參加完一個在日本舉行的學術會議，期間每當我要去酒店外面，我必須利用互聯網來搜索詳細的資訊，例如要乘坐那一班列車。若我在街上向別人問方向，有99.9%的機會對方連一句英文也不會說。雖然我已經盡了全力去收集資料，但有時候我還是碰釘子，例如我曾經想參觀兩個博物館，但有一個因為要準備下一個展覽而閉館，而另一個則因為裝修而關門，他們的網站只用日文，故此事前我毫不知情。參觀博物館也是一個令人懊惱的經歷，大多數博物館都缺乏英文或其他語言的解說。此外，酒店和航空服務員理應經常面對外國遊客，但跟她們說話也是「雞同鴨講」，「牛頭不搭馬咀」。

日本是一個非常矛盾的民族，一方面日本企業非常渴望從外部學習，從而提高他們的水平，但另一方面大多數日本人卻沒有興趣學習英語，從而與外界互動。日本裔英國學者濱崎步竹對日本的評語可謂一矢中的：「日本有一個全球化的經濟體系，卻沒有一個全球化的社會。」目前只有1.4%的日本人到海外留學，這一數字遠遠低於其他亞洲國家或地區，如香港、台灣、南韓。大阪大學工程系佐藤晴子教授是少數曾經在英美留學的日本人之一，她是此次會議其中一位主講嘉賓。她坦然說，當她從國外回來之際，她需要壓抑自己的憤怒，因為她質疑許多日本大學怎能在國際氣候下生存。許多日本學者只用日文發表演文，他們懶得去和別人用英語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她說，日本人不使用英語是一個深層次的文化問題：日本特殊主義和本位主義。她不是第一個指出日本特殊主義和本位主義這問題的人，在上世紀八零年代日本和美國之間的貿易大戰如火如荼，美國人抱怨日本人總是認為自己是獨特的，因而拒絕按國際規則玩經濟遊戲。

有趣的是，美國人抱怨日本人具有特殊主義和本位主義的心態，但美國也有一個類似的意識形態，這稱為美國例外主義（American exceptionalism），根據這一理論，美國與其他國家在本質上迥異，政治學家西摩·李普塞特（Seymour Lipset）認為，一七七六年美國獨立革命在全球創造了「第一個新國家」，這新國家建基於獨特的思想：自由主義、平等主義、個人主義、共和制度、自由放任的經濟。早期由英國移居至美洲的清教徒希望建

立一座「在山上的城市」（A city upon the hill），意思是要人人都可以看得到神的榮耀，因此有些基督徒相信美國是上帝特別製造出來的。

正如一開始時提過，大多數日本人和美國人都沒有興趣學習一門外語。雖然一個是亞洲國家，一個是西方國家，但是他們卻有許多相似之處：這兩個國家的強項是技術創新，兩者都是經濟強國，美國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經濟體，日本曾經是第二大經濟體，現在是第三；而兩者都是普及文化輸出國。或許因為他們的驕人成就，他們都認為自己是最特殊的。

藍色發光二極管（LED）是由美國加州大學聖巴巴拉分校的日裔工程學教授中村修與另外兩位日本科學家發明的，今年三人共同獲得了諾貝爾物理學獎。本來中村博士就職於一家日本公司，在中年時他決定移居到美國。中村博士說，在四十歲之前他一直被日本文化洗腦，發明了藍色 LED 之後，他開始參加國際會議，這改變了他的人生，現在他經常在自己國家以外發掘新的角度。既然他移民到美國，那麼他是否認為美國比日本更開放呢？非也，他說，美國人也傾向於以為自己的一套是最佳的，事實上大家都這樣做。

對我而言，「日本和美國十分特殊」是沒有意義的廢話，這和「你是很獨特的人」一樣，說了等於沒有說；每一個國家當然跟所有其他的不同，每一種文化當然都是獨一無二的。「美國是上帝特別製造出來的」也是空洞無物的，每一個人都是神的創造，同樣道理，每一個國家的出現也在上帝的計畫之中。然而，特殊主義和例外主義帶來了一種令人不自覺的文化優越感，這種心態的潛在邏輯是：我比其他人優勝，其他人當然要向我學習，為什麼我要刻意去學一門外語或採用別人的方法呢？

在英語中有這句箴言：「跳出框框來思考」（Think outside the box）。若要在思想上跳出框框，那麼身體也需要離開框框！像中村博士一樣，我也許喜歡參加國際會議和出國旅遊，希望有朝一日我也像他一樣榮獲諾貝爾獎！